

经济学名著译丛

政治经济学的 范围与方法



[英]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著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创于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政治经济学的 范围与方法

[英]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著
党国英 刘惠 译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英)约翰·内维尔·凯恩斯著;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经济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12978-7

I. ①政… II. ①约…②党…③刘… III.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688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经济学名著译丛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

〔英〕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著

党国英 刘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978-7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1/2

定价:30.00 元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John Neville Keynes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Macmillan and Co. , Limited

London, 1904

根据麦克米伦有限公司 1904 年版译出

纪念一百年前的经济学方法大论战

党国英 刘惠

学者们对人类社会的基本认识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人类社会变化最快的是生存技术与手段,而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信念、关于人自身的思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把握,就像一块难以撼动的巨石,我们难得动它一动。这是我们译完这本书的主要体会。这部著作问世已经过了一百年之久,但它所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与这部著作的广泛内容和深刻思想相比,我们的学力之浅薄使我们难以对它做出确切的评论。但为了更好地宣传这本书,使更多的人阅读它,我们还是斗胆对它做一介绍。

一、作者与时代背景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Keynes, John Neville, 1852—1949)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被尊为社会学家。他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杰出的早期弟子,又是经济学天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尽管其子的伟大成就更为世人所瞩目,但内维尔·凯恩斯本人的杰出学术成果也为后人所极力称道。内维尔·凯恩

斯长期在剑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还长期（1910—1925）担任大学注册主管这一最高行政职务。他 1891 年撰写的这本《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领导的新剑桥学派用作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标准教科书。对于新正统学者的倡导者来说，内维尔·凯恩斯的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标志着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在方法论方面发生的辩论的终结。这部著作提出了有关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疑问，并因此对经济学圈内和圈外的人士都发生了影响，成为学术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品。这本书的出版受到了马歇尔、陶西格、埃奇沃斯和帕尔格雷夫等著名学者的积极评价。也许因为和马歇尔的个人关系后来变得不愉快，内维尔·凯恩斯在 1910 年以后把他的精力主要花在了大学政治活动方面。这无疑影响了他的学术天才的发挥。

这部著作所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到现在对于经济学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已经进入经济学大门的人士和准备进入的学生，都应该读这样的著作。其他方面的社会科学家也应该研读这样的作品，社会学家就更不用说了。但实际情形不是这样的，这部著作所讨论的问题现在看来好像是老掉牙的问题，人们可以不理睬它们。关注这样的问题的人士已经限于很小的一个圈子了。或许人们还会疑问，当时的学者为什么会议论这些问题？我们相信，如果对当时的背景有一些了解，才能真正理解这本书的作者以及这本书本身的意义。

现在我们把经济学看作一种显学，这门学科的报告也很高，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优秀头脑。但经济学在大学讲坛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1776 年，亚当·斯密的杰出著作《国民财富

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了，但此后 100 多年里，经济学仍然不是显学。我们中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主要得益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似乎感到在马克思时代经济学已经很热闹了，其实不然。在剑桥大学，直到 1903 年才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而此前经济学是作为历史和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一部分来讲授的，大学里设置的经济学教授职位极少。为改变这种状况，马歇尔做了不懈的努力，J. N. 凯恩斯、西奇威克和福克斯韦尔都是马歇尔早年在剑桥大学的重要同盟者，他们一起为提高经济学的地位并肩奋斗。

在一百年前，经济学家还在反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转眼间，一切人文学科都在反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了。这是理论界的沧海桑田，很是耐人寻味。当时政治经济学受到很多方面的围攻，但概括地说，围攻出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知识体系，主要由伦理学和历史学构成；二是发端于孔德（Comte, Auguste, 1798—1857）的社会学。前者害怕政治经济学太大，后者又嫌弃它太小。几方面的冲突在后来被称为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大论战，但实际上这场论战不单是一个经济学方法问题，本质上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这场论战的谁是谁非，在我们看来当然很清楚，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阵营是正确的。我们说的“正确”，当然有其学理上的定义，但这里姑且不论。

门格尔教授曾生动地描述了“历史学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他说：“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

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序言)。这个描述不是耸人听闻，在当时是现实。那个时代以及更早时候的经济学家顶的是历史学或伦理学教授的头衔，撰写一部著作如果不讨论历史问题，是要遭受非议的。亚当·斯密博大精深，伦理学和历史学什么都能谈，所以不仅让学者们折服，也受政治家的尊敬。李嘉图的道行不高，主要在抽象概念之间演绎，便受到广泛攻击。对于这种状况，马歇尔和凯恩斯他们是难以容忍的。

对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展开攻击的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论点有三个：第一，它把政治经济学看作一个很高的伦理目标，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分析产生经济行为的各种动机，也应该评价它们的伦理价值的高低。第二，它认为没有跨越历史阶段的一般性的经济规律，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要具体地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第三，由此推论，因为各国的历史发展程度不同，所以在不同国家之间也找不到共同的经济规律。很有可能，德国学者的立场反映了经济地位相对弱小的国家对英国这个经济强国的对抗。

与历史学派的争论必然涉及人性假说的问题，因为如果存在一般的人性，且这种一般人性不大依赖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那么各国的经济规律就可能存在共性；即使它们的表现有所不同，也不会妨碍其本质的一致性。所以，双方的争论最终归结到这里，答案当然是不同的。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更多地强调“经济人”假说的可靠性，而历史学派当然坚持人性的多样性和易变性。

作为社会学的代表，孔德批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论极端贫乏。孔德和他的追随者认为，由于财富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

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任何把经济科学从一般社会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认为,社会现象作为一切现象中最为复杂的现象,其主题的不同方面在科学上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如果试图把社会的经济或产业方面的分析从知识、道德和政治分析中分离开来,一定是非理性的。他们也承认,财富的某些现象可以用科学手段加以分别研究,但他们否定这种研究能够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被人们以为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这一“科学老大”的研究结论就丰富得很吗?英国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谢尔布鲁克(Lord Sherlbrooke)对此曾做过很好的评论,他说,区别于各门特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要占上风还未到时候。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一天的到来需要更广泛地做出概括总结,办法是使研究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具体的科学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因此,一般的社会学知识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政治经济学则是它的一个分支。但经济学不能等待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建立。马歇尔教授也说:“大谈统一的社会科学的更高的权威是没有意义的。不用怀疑,如果它存在,经济学将乐意在它的卵翼之下寻求庇护。但是它不存在,也没有信息表明它将会出现。无聊地等待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看起来,从一开始,经济学家对社会学的治学抱负就不以为然,及至现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过多次数争论,每争论一次,经济学家高傲的脑袋便会扬得更高。

面对压力,英国经济学家投入了战斗,他们要改变经济学的“小媳妇”地位。杰文斯(Jevons, William Stanley, 1835—1882)是一个天才型的人,他把数学和功利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构建了经济

学的逻辑体系,给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由于他的早逝,英国经济学的领袖成了马歇尔。此人是一位硬汉子,为经济学的地位殚精竭虑,也为自己的地位寸步不让。反对者被他搞的筋疲力尽,不得不拱手称臣。他付出的代价,是把自己阵营里的朋友(包括内维尔·凯恩斯)也得罪了,但此后一百年经济学的繁荣这个大成果却与他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

内维尔·凯恩斯便曾经是马歇尔麾下的一名干将。在马歇尔的推荐下,他在牛津大学授课两个学期,这本书的素材来自这一时期的讲稿。他不愿意离开剑桥大学,但在这里,他只限于给印度的文职人员讲一些经济学的初级课程。这本书是他一生唯一的经济学著作,尽管他非常高寿,一直到他的伟大的儿子逝世以后三年,他才离开人间。虽然马歇尔对凯恩斯的这本书有过批评,但在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是给了高度评价,并推荐这本书为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方法教科书。大体在同一时期,西奇威克出版了《经济科学的范围与方法》(1885年),但相比之下,还是凯恩斯的著作在同一类的著作中影响更大。这本书后来经过两次再版修改,我们是根据1904年的版本翻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内维尔·凯恩斯的这本书是对当时经济学方法大论战的一个全面总结,也是对新古典主义方法论的一个全面展示。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也是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家马克·布劳格曾赞扬凯恩斯的这本书为“经济学方法论史的一块里程碑”(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序》)。

英国经济学家的立场对美国经济学家很有影响,并得到一批美国经济学家的支持。凯恩斯本人曾受到过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凯恩斯以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主要活跃在美国。

二、内维尔·凯恩斯告诉我们什么？

内维尔·凯恩斯的这本书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1. 什么是科学？政治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

“科学被定义为拥有普遍概括性结构（generality of form）的连贯的系统的真理的总和（body of truth）。缺少普遍概括性的真理不能构成科学；只要它们是零散的、不连贯的，也不称其为一般规律。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科学，不过是指它发现了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使之有机结合，并借助这些规律使特殊的经济事实得到解释。”按照这个见解，“甚至那些否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人士也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依赖系统的观察和分析，它包含了一整套可证伪的和可做理性判定的事实分析……这与被其他人称为科学的东西没有太大差异。”尽管不能说一切经济学著作都够得上这个科学标准，但提出这个标准本身是没错的。

2. 科学方法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凯恩斯对这个问题花了不少笔墨。他引用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1840—1921, Menger, Carl）的话说：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据此来说，我们在评价他们对学科发展本身的贡献之前，先应该仔细分析他们的方法。

那么,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得到如下归纳:

第一,政治经济学方法必须具有某种简明的和统一的性质。凯恩斯常常用一致的(*consistent*)或无差异(*uniformities*)这两个词表达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要求。他还说,“为了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一种精确的研究,保持一种简明的研究风格(*simplicity*)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保持这种风格,在无须检验的假设下去跟踪追逐财富的欲望所产生的后果,就既是正当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一开始先把其他动机放到一边,只承认自由观念和完全竞争,那么至少在研究工作的某些领域里,我们就可以确定更为稳定持久的行为倾向,并首先形成一种较为接近实际的认识。”实际上,这种方法也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方法。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成就也与他坚持这种科学观不无关系。

第二,政治经济学具有高度抽象性。凯恩斯赞成穆勒(*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和巴奇霍特(*Bagehot, Walter, 1826—1877*)主张在经济学推理中进行高度抽象的观点。巴奇霍特不止一次说,“政治经济学不是谈论真正的人,而是谈论假想的人;不是谈论我们所看到人,而是为了方便谈论我们以为是的那种人。”抽象必然要借助假说,但不能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假说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原理虽然只有在不存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才具有真实性,但政治经济学仍然应该是实证的、并非假说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当然不能任意假设,假设本身要有现实的根据。

第三,在一定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具有“价值中立”的性质。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科学,而不是艺术或伦理研究的分支。在竞争

性社会体制中,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立场中立的(standing neutral)。它可以对一定行为的可能的后果做出说明,但它自身不提供道德判断,或者不宣称什么是应该的,什么又是不应该的。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讨论越是独立于伦理和现实方面的考虑,这门科学就越能尽快走出争论阶段。伦理学闯入经济学只能导致已有的争论不断扩大并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如果对经济问题的伦理考察是系统的、彻底的,而不是情绪化的、浮躁的,那么,基本的伦理问题即作为长期争论主题的那些问题——例如,像公正基准的决定以及这个基准与一般实用主义标准的关系这类问题——是不能被排除的。然而,我们有必要只在最后一个阶段才去面对这些问题,有理由建立一个独立于这些问题的实证的经济科学。

第四,由以上方法必然导致政治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说为其逻辑演绎的前提,尽管这个前提历来遭受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尖锐批评。所谓“经济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受追逐财富的欲望的推动,二是有限理性。对后一点,凯恩斯当时还不可能提出什么值得称道的看法,但他对前一问题的讨论非常精彩。他指出,除过追逐财富这种欲望之外,其他动机当然也存在,并在不同的情形下决定着人的经济行为。然而,这些动机决不能成为需要考虑的第一位的东西,因为这些动机的影响是散在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靠的。据此可以认为,经济科学主要的学科范畴(principal subject-matter)“经济人”这个抽象完全是合理的和必要的;经济人的活动完全决定于其追逐财富的欲望。承认人们为自己树立的经济理想所发挥的实际的或潜在的影响,与人们对这些理想的客观价值的讨论,完

全是两码事；我们对经济科学的研究必须保持严格的实证性，同时，我们要详尽研究舆论的压力或公正、慈善和对大众福利关心的动机究竟能对经济现象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3.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是什么？

凯恩斯承认，政治经济学应该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应该是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生。经济学家也应该解决社会伦理的基本问题。事实上，如果要发现绝对的准则，政治经济学的诸种手段不可能孤立地建立在单一的理论科学基础上，这是一般规律，我们不可能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很早就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超越传统范围的可能性问题，他说，难道经济学家不能超越自己的研究范围吗？经济学家为了建立自己的科学基础，需要经济学本身所不能够提供的好多东西。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理论背景下，他不可能发挥这一论点。

出于论战的需要，凯恩斯把更多笔墨用在论证经济学的独立性问题，他针对的是孔德的社会学见解。他说，就政治经济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而言，政治经济学还没有被认为无法从一般的社会哲学划分出来。经济活动完全可能受到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的影响，反过来，经济活动也有可能影响其他社会活动。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把财富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分开进行研究是可能的。的确，从科学研究的要求来说，这样的孤立研究是必要的；科学依靠分析具体现象而获得进步，在研究中总是把构成事物整体的不同方面和不同要素分门别类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科学形成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独特的、虽然不是完全独立的分支。

4. 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是什么关系？

凯恩斯专门用一章来分析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批评了历史学派在这方面的许多观点。他指出，如果历史学家想恰当地发挥他的作用，他就应该坦然地努力建立现象之间的联系，探询事物的因果关系。但如果以为不去应用先前已经形成的一般理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每一宗历史事件能够被分开来研究，因果关系的认定既不需要演绎推理的帮助，也不需要与其他事件的研究做比较，那么，我们已经确认，历史的原因并不会“在每一个事件中用直接的证据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每一个研究案例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直接迹象，是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其中真正的因果关系纽带可能隐蔽于数不清的各种现象，所以，每一个观察者会遭遇一头雾水，要发现这种关系只有靠完备的科学知识。

凯恩斯似乎认为在科学研究中理论分析比事实描述有更大的意义。他说，正像历史具有批评理论的功能一样，理论也具有批评历史的功能。理论不能确定地告诉我们一定的变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现实后果，但它能揭示出什么样的后果是很可能会出现或者大概会出现的，并能指出每一种可能性的发生通常所需要的特殊条件。所以，理论能够当之无愧地批评和检验所发生的事实的是否是非曲直。

那么，经济学要不要历史学的帮助？凯恩斯的回答也是相当确定的：应有的态度是这样的——让我们简单地以劳动的科学分工的角度来考察问题，最好是在经济学领域里从事研究的人尽可能利用已经证明是有价值的材料，而不去花时间研究属于纯粹历

史学家的领域的问题。历史研究搞得越仔细越好；而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切认真的工作也将会帮助而不是阻碍其他领域的研究。

内维尔·凯恩斯在这本书里还提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获得了解决。例如，关于“公正”的含义，他论述说，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正常的价值由生产成本来决定，这是一种实证科学的分析。伦理问题的真正的解决办法，例如公平价格的构成问题的答案，可以认为竞争性的价格将是公平的价格，其条件是竞争诸方面都是自由的，竞争本身也是有效的。或者也可以认为，这里就没有一个理想的公平价格，并且在实践中找不到公平价格。他在这里有点语焉不详，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的。

内维尔·凯恩斯有点中庸之道，也许这是立场偏激的马歇尔批评他的主要原因；还有可能，正因为他受了马歇尔的批评，他会更倾向于坚守某种不偏不倚的立场，虽然他的基本倾向还是英国式的。例如，在谈到经济学的范围时他说，经济学家坚守中庸之道是可能的，即经济学家既不去想象他们的全部研究范围有一种完全不现实的明晰性，也不去通过否定那种在自然科学中必不可少的专业化，而绝望地被实际现象的复杂性所困扰。对于经济学的方法，他也说，片言只语不能充分地描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没有哪一种方法能说自己不需要与其他方法相配合。相反，只要看看政治经济学的个别分支或某个方面，合理的方法既是抽象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演绎的，也是归纳的；既是数学的，也是统计的；既是假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以为，像这样一些话，不说会更好，说出来也没有什么意思。